



世界末代皇帝演义 ● 张联芳主编

Mohammad Reza Pahlavi

白色君主巴列维

赵增泉 林明扬 郑耀群 著



张联芳主编

世界末代皇帝演义

白色君主巴列维

赵增泉 林明扬 郑耀群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色君主巴列维/赵增泉等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9

(世界末代皇帝演义/张联芳主编)

ISBN 7-5004-1576-1

I. 白… II. 赵… III. 巴列维-传记 IV. K833.73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08145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64千字 印数:1—10 000册

定价:7.40元

一个有益的补充

——写在《世界末代皇帝演义》出版前

三年前，我在《世界史通俗演义》总序中曾说：一门健全的历史学，应兼集科学性、艺术性和启喻性于一体。基于这一思想，两年前我在《浩劫与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序文部分，又浅析了对“历史演义”的一点想法。在本丛书出版前，一个主要考虑是简单谈谈“历史演义”可否作为传统史学的一个有益补充的问题。

我指的“历史演义”，具有特定含义。它主张于史有据，反对向壁杜撰，坚持以历史发展为主线，根据历史事实，经过艺术创造，传播历史知识。它演的是历史之真、历史之情，既有可信性，也有可读性，但非历史小说或演义小说。它与小说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有“生命”，有“情感”，有“神采”，不同点在于前者求实求真，提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可检验性，而后者则不同。“历史演义”是史学社会化、通俗化的一种形式，它体现了历史所固有的“三性”的特质。所以，不能一提“演义”，就以为是虚构编造，断定其缺乏依据。

那么，“历史演义”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又是怎样呢？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讲，“历史演义”不是传统史学的对立面，正相反，它是传统史学的有益补充，两者相得益彰。

历史的主体是人。排除历史人物，就无从谈历史。这是一条公认的道理。“历史演义”提出“以人带史”的命题，把历史探询的基点投向人物，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思想、情感、精神等因素的描写、刻画，来解释历史现象，阐明历史问题。而传统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大多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往往会忽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研究。诚然，也有涉及到人物的，但大多是作为身份性的人，诸如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思想家等，而常常忽略作为普普通通的人的社会属性，比如父母、兄弟、恋人、夫妻、子女等关系。“历史演义”探讨的正是被传统史学冷落，甚至被遗忘的这个角落。

历史的本质具有不可分割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它的科学性虽说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反复出现、检验，但人类的全部活动却是客观存在，并具有因果关系和规律性可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科学性的表现。目前西方出现的史学人文化的倾向，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它否定历史的科学理性，从而破坏了历史的完整功能。历史的艺术性表现在构筑历史的人，有生命、思想、情感、精神、意志之境界，其社会行为必然受到自身心理素质、伦理道德、文化修养、性格爱好等多种动机因素所支配。艺术性是人类一种高级意识行动，也是其超越自我的一个手段。他们的一切活动的实践内容和表现形式，可以说都是艺术的，在这点上，无论古今中外一般如是。

“历史演义”不仅重视历史的科学性，而且重视其艺术性，特别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因为如将历史单纯视作科学，其研究成果就可能是史料堆砌，加点理论分析，再用刻板的条条框框演绎成为干巴巴的公式或教条；如将历史单纯视作艺术，就会受到想象力的左右，偏离历史真实，沦入艺术的幻觉。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避免片面性。当然，要实现这种结合并不是很容易的，史学家只有经过努力才能在自己的具体实践中使其达到统一。还应指出的是，这种统一，又往往受到史学家的历史观、伦理观以及审美观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一个科学论点的提出，一般带有共通的、整体的规律性，当然也带有史学家个人意识上的烙印，但这只是一种心理学上而不是立论上的关联。然艺术性的表现，由于其研究对象本来就是个体，则必然带有作者更多的个人特色。而传统史学极易忽视历史艺术性的本质，难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历史演义”在这方面对传统史学具有明显的弥补功用。

历史既然是人的历史，探讨历史的奥秘断然不是任何单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所能奏功的。“历史演义”除了使用传统史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外，还应采取其他社会科学（如文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美学）甚至自然科学（如心理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学术原则，对形形色色的历史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历史演义”需要跨学科研究。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文和史本是一家，司马迁的《史记》等就是文史结合的优秀产物。从《史记》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

的创作着重描写人物并大量运用想象力、典型化、形象、拟人以及借景生情等后人所谓的文学方法。但是到了近代，文与史逐渐分家，特别是“五四”以来，由于对科学理性的片面理解，致使史学回复到以乾嘉史学为基础、实证主义为手段并进而排斥文学的路上。应该承认，文史分离是学科独立发展的结果，但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史学需要在更高层次同文学等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才能使自身得以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历史演义”是传统史学在新形势下获得突破性发展的途径之一，也是当今世界“跨学科研究”总趋势的一部分。

从事“历史演义”创作并非易事。它要求我们必须更新那种重科学轻艺术的陈旧观念，从思想深处认识“历史演义”也是一种研究，它是走史学通俗化之路，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还必须调整原有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从文风到史料的选择，来一番重新学习，全面更新，并学会运用多种学科的手段，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这样，对人类自身历史的描述才可能接近其本来面目，变得有血有肉，饱满耐读，回味无穷。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历史演义”虽然弥补了传统史学的缺陷，但同时也有可能带来史学过度分散化，亦即“碎片化”的弊端。人的思想、感情、精神等，并非绝对、纯粹和虚无缥缈的，它产生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会条件”（马克思语），是一定的经济环境、历史条件、社会结构的产物。因此，“历史演义”必须在客观研究社会和经济

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当今世界，史学研究应该是多元化的，“历史演义”理应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史学苑中占据一席之地。它不排斥传统史学，而传统史学也不应排斥“历史演义”，自以为是高学问，把人家看得很低。现在史学界的倾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不正常的。大家都不要走极端，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推进我国史学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历史演义”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并非尽善尽美，本套系列书以及过去出版的《世界史通俗演义》和《浩劫与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等，也只是初步尝试。其中的问题可能不少，主要是传统史学与文学等学科的结合还不够理想，艺术性尚显不足。不过，完善总是从不完善开始的。在出版社的关怀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帮助下，经过修改和补充，成功是可望的。

本系列书是近几年我和几位作者根据上述“历史演义”原则撰写的世界专题史系列演义作品之一。第一批出版的末代皇帝计有：法兰西的路易十六、德意志的威廉二世、俄国的尼古拉二世、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伊朗的巴列维和中非帝国的博卡萨。

所谓“末代皇帝（或国王）”，从政治学角度看，实际上包括两层意思：就统治者而言，末代皇帝即该王国最后一代统治者；就制度而言，末代皇帝一般反映了封建专制旧制度的命运和趋势。因此，可以说“末代皇帝”是一种政治现象。

“末代皇帝现象”，在世界各国都较为普遍存在。在漫长

的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频繁，因而与之相应的末代皇帝也为数较多，其中包括封建社会终结即资产阶级共和制建立前的最后一代封建皇帝，如收入本系列书的路易十六和海尔·塞拉西。然末代皇帝现象并非封建社会所独有，资本主义社会亦有之。本系列书收入的威廉二世、尼古拉二世、巴列维和博卡萨等属于资本主义社会。

末代皇帝是皇位的继承者，也是制度的继承者。他们继承的一般都是没落的、丧失存在价值的制度。因此，我们不能在评价时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王朝统治的陈年旧帐统统算在末代皇帝一人身上。本系列书第一批所收末代皇帝除个别人外，都说明了这一问题。比如18世纪70年代，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处于火山爆发的前夜；19世纪中期以后，俄国的沙皇制度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20世纪初，封建大厦已现将倾之势。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继承的正是这样的烂摊子。无论就他们的个人资质而言，还是从其所处时代的特点而言，专制制度都必然覆亡。这个结局是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所无法改变的。

从总体上看，末代皇帝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对待已经没有前途的制度。他们的选择一般有两种：一是顽固和死硬维护旧制度，延长旧制度的寿命；一是寻找新的途径，实行改革，弃旧图新。但因旧体制造成的后果积重难返，往往无法改变覆亡的命运。

本系列书之所以确定末代皇帝这一选题，是经过考虑的。首先，末代皇帝如同与之对立的民众，也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尽管其作用和历史地位不同，理应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但过去由于是被打倒的对象而很少有人问津。另外，历史人物包括末代皇帝的传记，因其经历传奇，最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这是自古以来特别是宋代听说评书培养起来的中国人的欣赏趣味所致。明清之际及30年代出现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演义热”，以及经过一段时间的“寂寥”之后又在近些年出现的历史人物“传记热”，都说明这种情况。一部著名的人物传记，实为人生经验与教训的最好总结，读者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人生借鉴。再者，末代皇帝处于新旧制度更替的动荡年代，其思想及活动除一般君主具有的特点外，还打着所处时代的烙印。研究和撰写这类历史人物，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重大转折和过渡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缓和与战争的真相，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看到世界未来的美好前景。另外，末代皇帝的生平，大多曲折、离奇，他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富有戏剧色彩，其宫廷秘闻更是鲜为人知。这些无疑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因此，在本系列书组稿时强调，除以“历史演义”的原则作为编写要求外，还要着意刻画人物的鲜明个性。所谓“个性”，就是人物秉赋、气质、素养等内在心理活动特征与性格、行为方式，包括形体在内的各种特点的总和。缺乏个性描写，人物就不会是历史的、具体的、个别的、活生生的，而是笼统的、抽象的、呆板的“千人一面”，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我们力图做到“一人一面”，每个末代皇帝不仅要有自己的出生、家世背景、童年、教育、婚姻、子女、嗜好、政

绩、即位与下台等，而且还得有与众不同的内心活动及七情六欲表现的特殊形式。同时，要力求准确而真实地反映末代皇帝生活的时代特征。这是我们认识、分析、评价问题的出发点。末代皇帝所处的时代，充满着激烈的斗争或冲突，而他们又离不开各自生活的特定环境。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与小的生活环境的有机结合，才塑造出末代皇帝这个畸形“产儿”。

现在收入本系列书的6本书稿作者中，既有史学界的学者，也有文学界的作家，他们有的是著译颇丰的知名专家，有的得到知名学者的匡正。也可以说，这是又一次推动我们迈向多学科协作的实际行动。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国内已出版有溥仪先生的《我的前半生》和贾英华先生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因其已单独成为“姊妹篇”，故未收入本系列书。贾英华先生是我的挚友，对中国“末代”的研究甚有造诣，撰著有多部晚清“末代系列”传记，因此请他为本系列书作序。在此谨致谢意。

我还愿意把本系列演义书献给我的夫人李瑞荷同志，如果没有她的大力支持、帮助与合作，这套书是难以同读者见面的。

张联芳

一九九四年岁次甲戌仲夏 于北京管庄寒舍

《世界末代皇帝演义》

序

绵绵延续而又曲折错综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人类不断演化迭进的过程。作为历史学家或文学家来说，无论他从哪一个角度去真实、而不是臆造地论证或描述人类发展的某一侧面或进程，都毫无疑问地具有隽永的历史价值。

从这个意义来说，张联芳先生等专家、学者实在是做了一件有益之事。他所主编的《世界末代皇帝演义》这套书，无论从历史性或知识性、趣味性上，都是具有一定收藏价值的。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已为世人所熟知。他不但经历了晚清、北洋军阀、民国时期，也活到了新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以及“文化大革命”初始……他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引起了世界上不同肤色的人们的兴趣。他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封建代表人物的经历，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变化缩影。有关他的书籍，多年来畅销不止，也说明了人们在不断地思考着超出他这个人本身经历的诸多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末代皇帝，作为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最高统治者和代表人物，他们与中国的

末代皇帝有何不同？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潮流裹挟下，他们一个个又落得了什么样的结局？……

欣读《世界末代皇帝演义》，感到这套书可以基本回答上述疑问。此外，它在题材以及丰富的史料方面也具有一定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引发深层次的思考。

如果换一个角度，客观地看，世界上的末代皇帝并非都是无所作为者。“生于末世运偏消”，时代的发展，决定了他们的灭亡，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封建社会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它的世袭制，二是等级制。皇帝，无疑是这两大特点的集大成者。它的崩溃，往往也是从这两方面开始的。研究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教训，建立更完善的制度，推进历史的进程。

封建时代的灭亡，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使此后生产力的发展大大前进了一步，也从制度上废除了十分落后的世袭制和等级制，为铲除人身依附创造了条件。这一灭亡的过程，实在是值得记述与研究的。

历史不会重演，但可借鉴。作为历史学工作者，如实地生动地记述这一崩溃的历史进程的代表人物——末代皇帝，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绝非妄言，如果再过若干年，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意义就更大了。

也正因为这套书的执笔者大都是史学专家、学者，而非文学家，他们在精选史料时，从客观史料出发，没有更多虚构和无端的渲染，所以更显得较为客观真实。

谓之“演义”，其实这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演义”。历史上的演义，如汗牛充栋。但凡提起，无不以《三国演义》或蔡东藩的多朝演义为题。以这两例名著而言，作者大体是以真实的历史为基本背景，在人物刻画和细节上经过了必要的虚构以及文学夸张，但是在大的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上，作者一般并非向壁杜撰——至少是采用了多种说法的一种。而《世界末代皇帝演义》与之相比，则又显得更为真实了：作者除了在景物的描写方面，凭借史料作了稍许符合实际的想象之外，基本内容都是有史料可依的。这种“演义”，可称之为“演”历史之景观，陈历史以“释义”。

历史学，走出“象牙塔”！历史学工作者走出书斋，走大众普及的路，这是一条成功之路。任何学问，如果没有民众，它就失去了价值，尤其是作为传媒作用的书籍，如果没有读者，它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如此看来，文史结合的作品，多年来经久而不衰，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类而言，历史总是具有启迪性，其“营养”之丰富，是任何其他学科都不好替代的。另言之，只要是真实地描绘史实的作品，便具有相当历史价值，也就无疑拥有读者。

自古以来，便有文史结合的著作问世。然而，真正能够传著于世、脍炙人口的，恐怕也是文史结合的作品居多。当然，并不排除其他纯历史学或文学上的精品之作。或者说，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或能反映人类重大足迹的力作，是能够真正历经淘汰而留传于世的杰作。

若谈到文史结合的传世之作，应首推《史记》。它不仅较为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更迭，也以其文章的盖世文采传颂至今。究其因，不外是史论结合的成果。研之，严谨丰硕，读之，琅琅上口，诵之，文采飞扬。对于《史记》，鲁迅曾有过精辟的评价，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确认其为文史结合的典范。至今，《史记》在《二十四史》中的文学地位仍是不可替代的。足证，文史结合的作品，具有无可非议的生命力。

“无文无以行远”。谁都知道，再有历史价值的题材，如果没有较好的文学描写形式——或称文采，去阐述其内容，则不免显得干瘪枯燥，读者读之无味，显然也就谈不到什么隽永的生命力，或者传诸后世了。

文学，历来以情节取胜，以文采夺人，以情感人，这是一般枯燥的历史教科书所不及的。而文史结合的作品，弥补两者之短，往往能激起不灭的“火花”。《三国演义》等名著历经数百年，广泛流传民间，至今仍脍炙人口，就是极好的范例。

当然，极言之，书籍的生命力的根本评判，在于读者。读者，是真正的“上帝”。

勿庸讳言，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末代皇帝陆续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有利于以生动的内容让我们各层次的读者了解世界史上的一个横断面——封建社会的解体，是一个多么斑驳陆离的过程，有着如何深刻的历史内涵。

囿于史料的局限，作者是基本依照现存史实而成书的，但亦采用某些文学手法增加一些色彩或神来之笔，或许，这将会吸引更多的读者。

当我的挚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联芳先生诚恳地邀请我为这套书作序时，我是感到诚惶诚恐的。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写了几本中国“末代”作品的业余作者。再者，这套书的著作者，多是我国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甚至参与者还有我的授业老师。在力辞不准的情形下，我出于对这套书的认识，也出于对历史学界前辈的尊敬，拉拉杂杂地撰写了这篇并不像序文的《序》。

贾英华

甲戌夏 于三里河三区陋室

作者简介

赵增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伊朗问题的研究，发表过不少论文专著，其中有《游侠纳斯列金与巴格达窃贼》等。

林明扬，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参加工作以来，撰写过不少文章，其中有《游侠纳斯列金与巴格达窃贼》等。

郑耀群，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辑。参加工作以来，撰写过不少论文与专著，其中有《“福科诺洛纳”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等。